

# 深化“两山论”助推共同富裕路径研究 ——浙江案例

徐剑<sup>1,2</sup>, 齐佳音<sup>3</sup>, 于法稳<sup>4</sup>

(1. 湖州师范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2. 湖州师范学院 “两山” 理念研究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3.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 人工智能与变革管理研究院, 上海 201620;

4. 中国社会科学院 农村发展研究所, 北京 100732)

**摘要:** “两山论”已践行17年有余, 评估其实践成效, 对于新时期更好地应用“两山论”助推共同富裕尤为重要。梳理“两山论”、共同富裕以及内生式发展原理本质与共性, 借助“两山论”践行效果映射共同富裕水平开展研究; 构建测度模型, 并在系统思维的指导下, 设计系统综合指标以及子系统指标来评价“两山论”践行成效, 递推区域共同富裕水平差异。之后, 以新时期共同富裕示范区两山发源地浙江省为例进行实证, 检验模型的可行性, 同时探索浙江省共同富裕建设过程中所隐含的普遍性路径。最后, 针对新时期“两山论”践行的深化发展与推进给出了政策建议, 助推共同富裕。

**关键词:** 共同富裕; “两山论”; 效果测度; 浙江省

## Deepening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to Boost the Path of Common Prosperity: With a Focus on the Zhejiang Case

XU Jian<sup>1,2</sup>, QI Jiayin<sup>3</sup>, YU Fawen<sup>4</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Zhejiang 313000, China;

2. Institute of “Two Mountains” Theory, Huzhou University, Huzhou Zhejiang 313000, China;

3. Institut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Change Management, Shanghai University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and Economics, Shanghai 201620, China;

4. Rural Development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has been practiced for more than 17 years.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valuate its practical effect for the better application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to promote common prosperity in the new era. This paper sorts out the essence and commonness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common prosperity and endogenous development principle, and carries out research by mapping the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with the practice effect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The measurement model is constructed, and under the guidance of system thinking, the system comprehensive index and subsystem index are designed to evaluate the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two mountains theory” and recurse regional common prosperity level differences. Then, Zhejiang Province, the birthplace of the two mountains in the new period of common prosperity demonstration zone,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test the feasibility of the model and explore the universality path implie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sperity in Zhejiang Province. Finally, policy suggestions are given for the deepening development and promotion of the practice of the “two mountains theory” in the new period to boost common prosperity.

**Key words:** common prosperity; “two mountains theory”; effect measure; Zhejiang Province

2020年3月29日至4月1日, 习近平总书记时隔15年再次来到浙江省安吉县余村, 肯定了余村的发展路子。2021年3月,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提出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作

为“两山”理念的诞生地, 其“两山论”践行效果长效发展对于助推共同富裕建设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两山论”的实践与理论相辅相成, 学术界对于“两山论”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两山论”内涵与发展解读、

**基金项目:** 中德科学中心合作交流项目“Sino-German Research Network: Digitalization and Aging”(GZ157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乡村旅游多元投资引致下的减贫效应差异与农民参与提升能力研究”(18YJAZH144)

**第一作者简介:** 徐剑, 博士, 讲师, 研究方向为农村经济、区域协调。E-mail: wwwhz1369@163.com

**通讯作者简介:** 齐佳音, 博士, 教授, 博士研究生导师, 研究方向为数据挖掘、区域协调。E-mail: qijiyin@139.com

“两山论”联动产业延伸、“两山论”相关制度保障三类。

(1)第一类：“两山论”内涵与发展解读。在国家以及地方相关政策的引领下，人们对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认识是不断变化且逐渐深入的。随着“两山论”社会实践的开展，对其相关理论的解读也日益成体系。学者们结合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历史、自然、发展角度进行剖析，探索“两山论”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进一步从生成、构造、价值、实践四重逻辑解读，并给出了“两山论”的发展模式，即生态资源经济化与经济发展生态化<sup>[1-2]</sup>。

“两山论”指出自然力与社会生产力有着内在的关联。从绿色发展的角度看，“两山论”的实践成效明确了生态就是生产力的理念，结合发展与保护的辩证统一，给出了新时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结构性变化的创新认知，进而探索“两山论”的实践路径<sup>[3-6]</sup>。同时，共同富裕的推进离不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sup>[7-8]</sup>，可见“两山论”践行与实现共同富裕有相通之处。

(2)第二类：“两山论”联动产业延伸。“两山论”的实践过程带动了许多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与各类产业都有着不同程度的关联，其中以旅游、农业为代表的产业联动效果尤为突出。“两山论”为乡村旅游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创新性的思维方式和实践方法，注入生态等元素，旅游经济体系的重建、乡村旅游市场化转型等一系列相关举措，更好地推动了旅游业的高质量发展<sup>[9-12]</sup>。“两山论”通过辩证方法论创新资源经济学，结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足短板，探索联动产业发展新路径<sup>[13]</sup>。

近些年，环境污染导致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具有普遍性，从逻辑上分析，环境源头治理是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的根本策略。全国各地在践行“两山论”方面做出了各种尝试，探索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之路，这些探索可以从源头上防止环境群体性事件的发生<sup>[14]</sup>。

(3)第三类：“两山论”相关制度保障。践行“两山论”需要完善相关考核评价体系，需要严格的生态环境评价制度提供制度保障。首先，需要找出目前环评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明确其短板因素，推进环评制度改革，保障“两山论”的高质量践行。其次，在实施具体措施方面，可以在“两山论”分类实践进程中，通过增加确定的考量因素、完善绿色信贷激励机制等举措实现政策导向、经济激励，以及通过职权职责的制衡配置、生态保护红线越线责任的行政协同、环境信用特色评价的指标设置等措施实现制度保障。总之，“两山论”是人类社会发展所必需，是对生态资本的合理应用，在实际应用中，要注意制度配套，避免经济资本遮蔽生态资本<sup>[15-16]</sup>。

关于“两山论”践行成效的案例研究，国内也有学者进行了探讨。有关浙江省案例的研究指出，应满足并促进多元主体参与下的不同利益诉求的协同发展，结合“两山论”，从分析自然资源供给侧问题的产生及发展出发，以满足治理过程中利益相关方多元需求为方向，构建一种适宜于该地区的多元主体下的自然资源治理体系<sup>[17]</sup>。田淑英等<sup>[18]</sup>通过调查分析指出，新安江流域安徽段践行“两山论”应进一步丰富生态经济发展模式，打响特色生态经济品牌，搭建生态经济发展平台，拓展生态产业发展路径，加强绿色财源建设，健全生态经济发展保障机制。另外，浙江在实践“两山论”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探索，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且对浙江自身乃至全国今后更好更快的发展都具有启发意义。

然而遗憾的是，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均为定性研究，即便是“两山论”践行效果的案例分析，也多是理论阐述与探索，对于“两山论”践行效果的定量分析，学术界的工作还是比较缺乏。随着相关研究的日益深入以及实际工作部门对“两山论”践行效果定量测度需求的不断增长，本文认为构建一套系统科学的方法来度量“两山论”践行效果，且通过数据分析明确“两山论”践行过程中的主要影响因素，给出区域进度比较以及提升空间的度量，可以推进“两山论”向纵深方向发展，实现区域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正处于认真落实并推进共同富裕建设的重要时期，本文的研究在此背景下具有一定理论和现实意义。

## 1 相关理论

### 1.1 “两山论”

人们理解“两山论”中的“绿水青山”通常是指维系生态安全与物种平衡、保障生态调节功能、提供良好人居环境，包括水、大气、森林、土地等生态要素所形成的各种类型的生态系统。践行“两山论”的目的不仅仅是通过内部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实现GDP的增加，更是为了实现区域环境、福利、教育和文化水平的综合提高。长期以来，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许多学者依据自己的学科背景提出了不同的发展范式，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美国学者莱斯特提出的一种发展模式，即“以生态法则为导向的生态化经济模式”，是一种具有可持续性的减物质化发展模式，能以资源环境压力零增长或负增长的生态支出实现经济的绿色增长<sup>[2]</sup>。事实上，为了有效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两山论”已经系统提出了具体的发展模式，即生态资源的经济化，经济发展的生态化，实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一方面，实现生态资源经济化，将“绿水青山”同土

地、矿产等自然资源一样,看作是生产要素,能够为人类社会带来巨额收益,以及长期稳定的价值流,将其作为资产来管理,即将“绿水青山”的价值资产化。优先发展“绿水青山”的内生性产业,即与“绿水青山”共存共生的产业,除此之外,还可以发展“绿水青山”延伸、派生与配套的产业。以“绿水青山”的价值促进生态资源增长,形成生态资源产业的良性循环。

另一方面,实现经济发展生态化,实际上是一种渐进式绿色发展,是传统高能耗高污染发展模式向生态化、绿色化发展的转型,经济快速增长是政绩,生态保护和建设也是政绩。将“绿水青山”作为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变量因素,与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政策和制度等一起纳入生产要素中,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调整对象,推动经济发展生态化。

## 1.2 内生式发展理论

“内生式发展”又称“由下而上的发展”或“自我发展”。1975年,瑞典一家财团在关于“世界的未来”的联合国报告中,正式提出了“内生式发展”的概念。这一概念的要点为——消除绝对贫困,自力更生,保护生态,必须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sup>[19]</sup>。20世纪80年代,许多乡村地区的衰落现象重新得到关注,不发达地区的乡村发展问题逐渐成为全世界共同的课题,多数研究者认为,如果想要获得本地区社会、经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就应采取内生式发展<sup>[20]</sup>。随之,相关研究工作不断深入,大量学者借助内生式原理来探索乡村的可持续发展<sup>[21-25]</sup>。但目前为止,学术界尚未形成统一定义,主要的代表观点如下。

VAN DER PLEOG 等<sup>[26]</sup>认为:“内生式发展意味着一个本地社会动员的过程,它需要一个能够将各种利益团体集合起来的组织结构,去追求符合本地意愿的战略规划过程以及资源分配机制,其最终目的是发展本地在技能和资格方面的能力。”宫本宪一<sup>[27]</sup>认为,内生式发展的要点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地区内的居民要以本地的技术、产业、文化为基础,以地区内的市场为主要对象,开展学习、计划、经营活动,但这并非地区保护主义;在环保的框架内考虑开发,追求包括生活适意、福利、文化以及居民人权的综合目标;产业开发并不限于某一种相关产业,而是要跨越复杂的产业领域,力图建立一种在各个阶段都能使附加价值回归本地的地区产业关联;建立居民参与制度,自治体要体现居民的意志,并拥有为了实现该计划而管制资本与土地利用的自治权。

概括来说,虽然对于内生式发展定义的描述各有不同,但仍存在着相通的要点。参考相关研究,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内涵应包括:(1)区域发展的最终目的是培养

区域自身发展的能力,这种能力不能以牺牲本地的生态或者文化作为代价,进而实现地区的可持续发展。(2)以区域本地居民作为地区开发主体,使当地人成为区域发展的主要参与者和受益者,提高其参与的积极性。

## 1.3 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具有历史阶段性渐进逻辑,主要有以下几个阶段: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有许多论述都与这一思想有密切联系;列宁在领导苏联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进程中,也提出了发展生产力,达到社会“共同富裕”的思想,同时用来指导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1953年,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首倡共同富裕,且对在当时中国的实际情况下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已经有了一个比较系统的阐述;邓小平1978年12月13日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对于什么是共同富裕以及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给出了比较系统的阐述与思考;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强调,新征程上要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共同富裕成为新时期重要任务。

鉴于对共同富裕的理解是多方面、多视角的,学者们结合共享理念<sup>[28]</sup>、脱贫攻坚精神<sup>[29]</sup>、内生性与规律性<sup>[30]</sup>、指标体系构建<sup>[31-33]</sup>等,从不同角度给出了探索,总结如下:(1)共同富裕建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之上,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具体实践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2)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要求,是新时代全体城乡居民的全结构福祉,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福利。

综上所述,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内涵超出了单纯的物质丰富范畴,而是全国人民共同创造和发展的总体成果,是包含多方面的全结构福祉。如绿色生态发展为民众提供了公共环境产品,也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价值可以更广泛转化为人民的共同财富和福祉。

内生式发展更加注重区域的利益和环境保护,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思路,这与“两山论”、共同富裕的本质是一致的。本文将构建量化模型来测度“两山论”的践行效果映射共同富裕水平,为推进“两山论”深化发展、实现共同富裕给出建议。

## 2 模型构建

### 2.1 指标体系构建

新时代的共同富裕在内涵上是全结构福祉,但在操作测量时,学术界和政策部门一般用经济、人口、社会以及生态环境等综合指标来观察富裕差距,这与“两山



论”成效的测度是一致的<sup>[10]</sup>。“两山论”是从宏观层面提出了生态与经济、人口、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思想，从操作层面借助内生式发展原理提出了生态与经济、人口、社会发展相互促进的途径。接下来，将共同富裕、“两山论”和内生式发展原理相结合，构建“两山论”的践行效果测度模型，递推共同富裕水平。

对于“绿水青山”的测度，结合其定义，用系统层指标(生态环境子系统)表示，从正负两个方面借鉴PSR指标框架，从生态环境状态、生态环境压力、生态环境保护三个维度构建一级指标。对于“金山银山”的测度，根据内生式发展原理的内涵，用系统层指标(区域发展子系统)表示，结合一级指标从人居环境、经济、社会三个方面度量。从整体出发，把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看作一个系统，来测度生态环境与区域发展的协调度，得到整个系统内生式发展成效，进而划分“两山论”践行效果的等级，递推共同富裕水平差距，具体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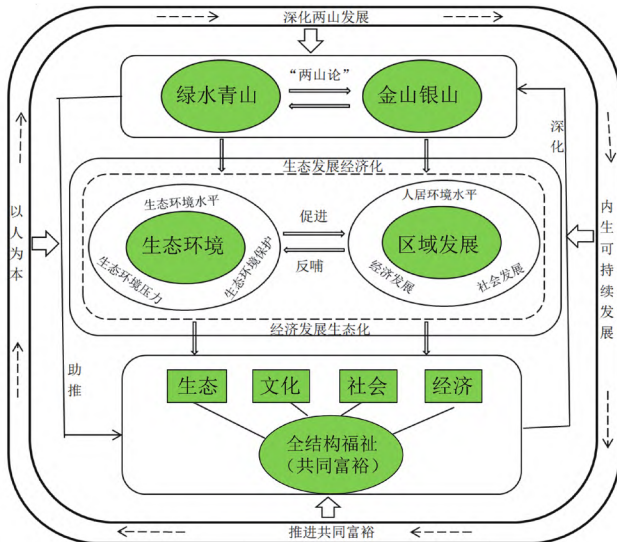


图1 共同富裕背景下“两山论”践行成效测度模型

以测度共同富裕背景下“两山论”践行效果为目标，结合内生式发展原理，构建指标体系(表1)，为接下来进行定量分析等一系列研究奠定基础。

另外，本文在这里定义：用“两山论”践行效果映射共同富裕水平，将其分为四个等级：优、良、中、差。其中，“两山论”践行效果“优”为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子系统较高水平协调发展，践行效果“良”为两系统高水平协调发展，践行效果“中”为两系统基本协调发展，践行效果较“差”为两系统低水平协调发展。

## 2.2 研究方法

按照熵值法的运算流程，将原始数据执行数据的标准化和权重值计算，主要计算过程如下。

表1 共同富裕背景下“两山论”践行效果指标体系

目标层	系统层	一级指标
共同富裕背景下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	区域发展子系统	人居环境水平
		经济发展
		社会发展
	生态环境子系统	生态环境水平
		生态环境压力
		生态环境保护

步骤1:数据标准化,采用归一法无量纲化处理数据;

步骤2:权重计算;

步骤3: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

$$f(x) = \sum_{j=1}^m a_j x_j \quad (1)$$

$$g(y) = \sum_{i=1}^n b_i y_i \quad (2)$$

式(1)、式(2)中: $f(x)$ 、 $g(y)$ 分别表示区域发展、生态环境子系统的综合效益, $a_i$ 、 $b_i$ 代表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子系统中各指标的权重, $x_i$ 、 $y_i$ 分别描述的是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指标特征的指标值,且均为无量纲化值。

步骤4,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子系统模型构建。借鉴物理学中的概念,耦合度( $C$ )是描述系统中各要素彼此相互作用影响的程度,用来分析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的耦合评价模型,计算公式为:

$$C = \sqrt{f(x) \times g(x)} / [f(x) + g(x)] \quad (3)$$

耦合度 $C$ 的取值范围为0~1(其中 $C$ 取值0表示“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系统耦合度极小,各指标都处于无关且无须发展的状态; $C$ 取值1表示系统耦合度达到最大,之间达到良性共振耦合),且可以划分为四种类型(优、良、中、差)。

由于区域发展和生态环境子系统各自组成和发展的差异性,仅仅通过计算耦合度有可能会产生误差,导致结论与实际结果不符。为了防止该情况的出现影响最后结果的准确性和分析的合理化,为此建立了耦合协调模型,便于更为客观地反映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

$$T = af(x) + bg(y) \quad (4)$$

$$D = \sqrt{T \times C} \quad (5)$$

式(4)、式(5)中: $D$ 表示“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度, $T$ 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根据 $D$ 的不同取值范围,设计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子系统耦合协调发展区间,进而划分“两山论”践行效果等级,如表2所示。

## 3 研究对象

富裕是人类在比较体系中界定的一种生活状态,所以不但具有不同发展阶段的历时性,更具有当下比较水平的现时性<sup>[34]</sup>。本文选择以浙江省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

表2 共同富裕背景下“两山论”践行效果等级

总类型	协调度区间	提升空间测算	分类型	“两山论”践行效果等级(共同富裕水平)
共振耦合	$D=1$	—	—	极优
较高水平协调	$0.8 \leq D < 1$	$ f(x)-g(y)  > 0.1$	较高水平协调(有提升空间)	优-
		$ f(x)-g(y)  \leq 0.1$	较高水平协调	优
高水平协调	$0.5 \leq D < 0.8$	$ f(x)-g(y)  > 0.1$	高水平协调(有提升空间)	良-
		$ f(x)-g(y)  \leq 0.1$	高水平协调	良
基本协调	$0.3 \leq D < 0.5$	$ f(x)-g(y)  > 0.1$	基本协调(有提升空间)	中-
		$ f(x)-g(y)  \leq 0.1$	基本协调	中
低水平协调	$0 < D \leq 0.3$	$ f(x)-g(y)  > 0.1$	低水平协调(有提升空间)	差-
		$ f(x)-g(y)  \leq 0.1$	低水平协调	差
无关耦合	$D=0$	—	—	无

注：“-”表示在目前的发展等级中处于较低级别，根据  $|f(x)-g(y)|$  与 0.1 的大小对比得到。表 5 同。

(1)浙江全省率先提出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示范样本的宏伟蓝图，积极为全国探路先行，具有很强的政治性、现实性和可行性，谋划走出一条特色鲜明的共同富裕新路子，为全国提供了浙江样本。浙江省各项指标都走在全国前列，如城乡差距、人均可支配收入、区域均衡发展、富裕程度等，是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要条件。(2)浙江省作为“两山论”发源地，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生态环境治理标志性工程，同时制定并规范生态标准，在制度设计与改革上不断创新，使得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发展，生态优势不断向经济优势转化，通过发挥自身生态优势，成功打造了一批以安吉、丽水等为代表的绿色浙江旅游品牌，以及以三衢味等为代表的生态品牌，生态经济效益稳步增长，充分实现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两山”理念践行的典型代表区域。(3)浙江省具有独特的地理优势，虽然浙江省的土地面积仅占全国的 1.1%，但是却拥有平原(杭嘉湖平原、宁绍平原)、盆地(金衢盆地)、海岛(舟山群岛)、丘陵(浙西南)等各种地貌。其“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结构，从中孕育出多样化的城乡类型。从第一梯队的杭州，到中等规模的温州、绍兴、嘉兴、台州，再到县级的义乌、诸暨、龙港，镇级的横店、店口、乌镇等，浙江拥有一个完整且发达的城乡体系，其各地实现共同富裕的模式机制，也适用于东中西部各种区域类型，具有区域代表性。

### 3.1 指标及数据选取依据

本研究综合运用综合频度法、理论分析法和专家咨询法，根据相关文献<sup>[35-39]</sup>作为指标选取参考依据，且结合浙江省各市的区域发展和生态环境特点进行仔细斟酌，最终确定 22 个二级指标，构建了适合浙江省共同富裕背景下的“两山论”践行效果评价指标体系，如表 3 所示。

表3 共同富裕背景下“两山论”践行效果评价指标体系(浙江省)

目标层	系统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类型
共同富裕背景下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	区域发展子系统	人居环境水平	城镇化率/%	+
			建成区面积/平方千米	+
			城市人口密度/(人/平方千米)	+
		经济发展	人均GDP/万元	+
			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	+
			全社会就业人员年末数/万人	+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增加值/亿元	+
			农林牧渔业增加值/亿元	+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	+
		社会发展	千米里程/万千米	+
			在校大学生数/万人	+
			卫生技术人员数/万人	+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亿元	+
			年末实有道路面积/万平方米	+
	生态环境子系统	生态环境水平	森林覆盖率/%	+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
			水资源总量/亿立方米	+
		生态环境压力	化肥施用量/万吨	-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万吨	-
		生态环境保护	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	+
			城市污水日处理能力/万吨	+
			空气质量和好于二级天数比例/%	+

### 3.2 数据处理

本文数据来源于 2020 年《浙江统计年鉴》、2019 年浙江省环境统计年报以及浙江省 11 市 2019 年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将 11 市的数据进行平均，并对各项数据进行极差法处理，计算出其对应的最小值、最大值、极差，判断类型，并在此基础上得到正、负向指标。

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公式，依次计算出 11 个市的相关指标  $f(x)$ 、 $g(y)$ 、 $C$ 、 $T$ 、 $D$ ，其中， $f(x)$  代表的是各市的区域发展综合评价指标， $g(y)$  代表的是各市的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 $C$  代表的是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 $T$  为耦合协调发展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数， $D$  代表的是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并依次对区域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和两者的耦合协调度进行排序，如表 4 所示。

表4 浙江11市系统综合指标、子系统指标数值统计分析

城市	区域发展子系统指标		生态环境子系统指标		提升空间测算 $ f(x)-g(y) $	系统综合指标数值			
	$f(x)$	排名	$g(y)$	排名		$C$	$T$	$D$	$D$ 值排名
杭州	0.910	1	0.445	7	0.465	0.470	0.677	0.564	1
衢州	0.198	10	0.609	3	0.411	0.430	0.403	0.417	8
丽水	0.215	9	0.688	1	0.473	0.426	0.452	0.439	6
台州	0.311	6	0.654	2	0.343	0.467	0.482	0.475	3
绍兴	0.408	4	0.496	4	0.088	0.498	0.452	0.474	5
湖州	0.258	8	0.343	10	0.085	0.495	0.300	0.385	9
金华	0.302	7	0.451	6	0.149	0.490	0.377	0.430	7
温州	0.458	3	0.445	7	0.013	0.500	0.451	0.475	3
嘉兴	0.333	5	0.188	11	0.145	0.480	0.260	0.354	11
宁波	0.542	2	0.408	9	0.134	0.495	0.475	0.485	2
舟山	0.136	11	0.484	5	0.348	0.413	0.310	0.358	10

### 3.3 共同富裕背景下“两山论”践行效果对比分析——系统综合指标分析

(1)表4从区域发展子系统指标、生态环境子系统指标、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系统综合指标数值三个方面,分别给出了11市发展状况的具体数值及排名,图2借用图形直观展示,使得“两山论”在浙江省的践行效果一目了然。由图2可知,在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关系中,只有杭州目前处于高水平协调发展阶段( $0.5 \leq D=0.564 < 0.8$ ),即“两山论”在杭州实践效果最佳,其余10市均处于基本协调阶段( $0.3 \leq D < 0.5$ ),也就是说浙江省各个区域“两山论”践行成效是相对均匀的,即贫富差距相对较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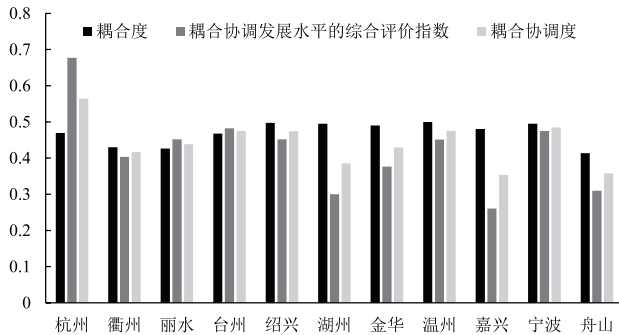


图2 浙江11市“区域发展—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标数值

(2)结合表4的数据,由表5可知:第一,杭州、宁波两市的“两山论”实践效果排前二名,同时杭州、宁波区域发展水平在11市中同样排前二名,生态环境水平相对较差,且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子系统指标差值都大于0.1[即杭州 $|f(x)-g(y)|$ 为0.465,宁波 $|f(x)-g(y)|$ 为0.134],说明在此等级中两者耦合发展还有提升空间,即“两山论”实践效果可以加强,共同富裕水平可以进一步升级,从而实现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的较高水平耦合。

第二,“两山论”实践效果台州、温州并列第三,耦合协调度值为0.475,处于基本协调阶段( $0.3 \leq D < 0.5$ ),但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子系统指标差值,台州为0.343 $> 0.1$ ,温州为0.013 $< 0.1$ ,说明台州、温州在此等级基础上两者耦合发展提升空间台州市相对要大一些。

第三,其他7个市中,衢州、丽水、嘉兴、舟山4个市协调等级为基本协调,且其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子系统综合指标差值均大于0.1,“两山论”践行效果为“中-”,说明它们在目前的发展等级阶段还有提升空间,即“两山论”实践效果可以加强。其中,衢州、丽水、嘉兴系统综合指标差值大于0.35,尤其是丽水差值为0.473,系统协调发展空间巨大,助推“两山论”的发展大有前景,值得注意的是,不同市情况不同,应对症

表5 共同富裕背景下11市“两山论”践行效果等级分类

城市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两山论”践行效果(共同富裕水平)
杭州	0.564	高水平协调发展(在此等级中有提升空间)	良-
衢州	0.417	基本协调发展(在此等级中有提升空间)	中-
丽水	0.439	基本协调发展(在此等级中有提升空间)	中-
台州	0.475	基本协调发展(在此等级中有提升空间)	中-
绍兴	0.474	基本协调发展	中
湖州	0.385	基本协调发展	中
金华	0.430	基本协调发展(在此等级中有提升空间)	中-
温州	0.475	基本协调发展	中
嘉兴	0.354	基本协调发展(在此等级中有提升空间)	中-
宁波	0.485	基本协调发展(在此等级中有提升空间)	中-
舟山	0.358	基本协调发展(在此等级中有提升空间)	中-

下药取得长效发展助推共同富裕。

第四,浙江省“两山论”践行效果中,舟山排名第十,主要原因是该市受制于较小的土地面积和人口规模,确实在经济发展上难以有很大的作为。衢州、丽水排名不高,在地理位置上,更加直接体现了浙江省“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地形地貌。但是相较于舟山、宁波、台州、温州等市而言,衢州、丽水两市缺乏出海口,使其在开展国际贸易时需要增加更多的成本。

最终得出了11市“两山论”践行效果:杭州效果为“良-”,绍兴、湖州、温州效果为“中”,其他7个市践行效果为“中-”,详见表5。

### 3.4 “两山论”论践行效果对比分析——子系统指标数据分析

#### 3.4.1 区域发展子系统

区域发展水平,从经济、社会和人居环境水平三个角度分析,结合区域发展综合指数排名(表4)可知:杭州、温州、宁波为前三名,但杭州区域发展综合指数数值为0.910,远远高于温州和宁波;金华、台州、嘉兴、绍兴区域发展综合指数排名比较集中, $f(x)$ 取值在0.30~0.41之间;其余4个市,区域发展综合指数排名比较靠后,数值均低于0.3。

杭州区域发展综合指数数值排名第一,与其余10市差距较大。杭州依靠科技自立、数字变革、高端产业引领、扩大内需,从而打造面向世界的创新策源地;建设新时代数字杭州,建设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形成国内大循环的强大动力源;浙江省提出发展万亿级信息经济产业,集合点就在于跨境电商,提升杭州外贸新的增长点,推动更高水平开放,构筑国内国际双



循环的强大链接点。要锚定共同富裕方向,建设幸福示范标杆城市,嘉兴、湖州可以借助地理优势,建立杭州经济—生态共同富裕都市圈,从产业推广、人口流动、教育支持、生态共建等方面带动杭嘉湖区域整体发展。

区域发展综合指数排名比较靠后的衢州、丽水两市,均为缺乏出海口的内陆地区,特性中具有共性,除继续坚持绿色发展模式,发展旅游业、物流业等第三产业带动区域发展之外,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因地制宜发展区域经济。具体来讲,衢州可以利用研究院现象,发挥科创大平台的创新引领作用,依托浙江大学衢州研究院与工程师学院衢州分院项目支持相关氟硅产业高质量发展,带动区域经济;另外,衢州作为国家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需要不断强化生态资源整合,以实现“两山”转化为目标,通过探索“两山”银行,唤醒沉睡的生态资源,为当地经济发展赋能。丽水可以通过“双招双引”,做大做强生态工业,推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比如:发展人才高地,同时借助世界丽水人大会平台优势,激发在外丽商(侨商)潜能;深耕细分产业领域,开展传统优势产业补链强链延链招商,推进智能装备、生命健康等产业差异化布局、协同化招商,推动全产业链发展;大胆发力未来产业,加快在第三代半导体、大数据、金属新材料等领域培育发展生态工业,做到产销一体化,工业企业之间形成一定的行业集聚效应。

### 3.4.2 生态环境子系统

生态环境方面,丽水、台州、衢州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排名前三,可以借助生态优势,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加快发展特色农产品加工等绿色产业。湖州、嘉兴排名最低。近几年,嘉兴两次被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警示片披露问题,相对于区域发展指标排名,生态环境指标数值排名比较靠后。

绍兴、舟山、金华、温州、杭州、宁波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比较集中,  $g(x)$  取值在 0.4 ~ 0.5 之间。近几年舟山积极完善生态环境的修复,打造内河“水下森林”,对于违法围填海项目积极整改,实现海域生态重生,相比区域发展指标排名,其生态环境指标数值排名较好。然而,宁波生态环境综合指数排第九名,作为港口城市,区域发展较好,生态环境指标数值发出预警,需进一步调整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持续推行建筑施工扬尘治理,高标准实施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开展工业固废收运体系建设,注重生态保护实现经济可持续。

共同富裕时期浙江省“两山论”践行效果中,结合子系统指标数值、子系统指标差值以及系统协调度数值进行全面分析,得出以下结论和具体推进建议,见表 6。

表6 浙江11市“两山论”进一步推进建议

城市	区域发展指数	生态环境指数	“两山论”践行效果(共同富裕水平)	结论与推进建议
杭州	0.910	0.445	良 -	注重可持续发展,侧重经济发展生态化;继续推进“两山论”,缩小子系统间差值
衢州	0.198	0.609	中 -	利用研究院现象,依托浙大衢州两院项目支持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生态资源整合
丽水	0.215	0.688	中 -	特殊区域(一市一区)特殊政策,在生态环境允许范围内,发展民营经济助推共同富裕,如通过“双招双引”,做大做强生态工业,推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台州	0.311	0.654	中 -	借助生态优势,围绕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开发,加快发展特色产业,深化两山成效
绍兴	0.408	0.496	中	能矿资源丰富,具有优势产业,注重环境保护,建立循环经济生态型工业示范基地
湖州	0.258	0.343	中	发挥地理优势,从产业推广、人口流动、教育支持、生态共建等方面综合发展,同时利用品牌效应,使得生态资本化
金华	0.302	0.451	中 -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继续推进“两山论”,缩小子系统间差值
温州	0.458	0.445	中	恰当处理内源与外生关系,深化两山成效,加快发展步伐,进入高水平协调发展阶段
嘉兴	0.333	0.188	中 -	利用地理优势,注重产业结构调整,加强环境保护,推进“两山论”
宁波	0.542	0.408	中 -	调整优化产业、能源结构,持续推行建筑施工扬尘治理,高标准实施工业园区“污水零直排区”创建,开展工业固废收运体系建设,注重生态保护,实现经济可持续。
舟山	0.136	0.484	中 -	常住人口较少,面积小,借助其地理优势,发展外贸经济,从产业、人口、教育等方面带动区域发展

(1) 11 市中,除杭州属于高度协调发展外,其余 10 市均为基本协调发展,也就是说,浙江省区域共同富裕水平较好,均衡发展,不存在贫富极端分化,而杭州作为共同富裕示范区省会城市,其地位、重要性、与深圳的先行示范区、上海的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是相当的,远远高于其余 10 市合乎情理。

(2) 11 市中,区域发展指标数值排名较好的,生态环境排名相对较差。结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可知经济的发展对环境可能会造成负面影响,深化“两山论”对于经济可持续至关重要,生态经济化与经济生态化协同才能长效助推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3) 结合地理位置、区域特征、人口、经济、政策等,11 市 11 种情况,如台州与温州耦合协调度数值一样,均为 0.475,但台州子系统差值为 0.343 > 0.1,温州子系统差值为 0.013 < 0.1,因此其深化“两山论”措施侧重点相差巨大,台州应注重生态资源转化,在基本协调发展阶段加快缩小子系统间差距,而温州市应侧重

寻找生态经济协同发展新路径,加快进入高度协调阶段。丽水、衢州均为缺乏出海口的内陆地区,具有共性,但两市政策标准也具有自身特性,即统一性与灵活性兼顾。总之,一味强调生态环保或者只看经济指标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本质(全结构福祉),新时期政策制度以及衡量标准应因地制宜对症下药,才能真正实现共同富裕。

## 4 结论与建议

### 4.1 结论

本研究通过梳理新时期共同富裕、“两山论”以及内生式发展的本质,构建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模型开展研究,结合人口、社会、经济以及环境水平、环境压力、环境保护多指标进行测度,创新性地提出了测度共同富裕背景下“两山论”践行效果的定量模型。之后,以浙江省为例进行实证分析,来检验该模型的可行性。根据系统综合指标、子系统指标以及子系统指标差值给出了详细的浙江省“两山论”践行等级划分,递推共同富裕水平,并提出有针对性的发展建议,对于助推浙江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具有很大实践参考价值。

### 4.2 建议

依据上述模型及结论,对于“十四五”时期“两山论”深化助推共同富裕给出以下建议:

(1)区域内与区域间协同并进发展,强化区域协同联动效应。区域协调发展不是平均发展、同构发展,而是优势互补的差别化协调发展,各区域充分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各展其长、优势互补、竞相发展,促进产业梯度转移,使得区域发展的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形成中心带动、多区协同模式。创建先行示范带、创新驱动带、协调发展带,全方位实现区域内部协同发展,区域间互动合作,并将以此带动多区域梯次联动并进。

(2)发展民营经济推动共同富裕。民营经济是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主体,通过聚集大量海内外高级人才,提高劳动者素质,夯实人力资源优势实现动力变革。同时,政府通过完善制度体系,建立全面的监督机制,强化激励机制,激发社会责任意识等措施激励民营企业践责助富。具体措施如:调整税收;建设全国科技创新创业人才联盟,推动科技资源向民营企业开放共享;积极鼓励民营资本举办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探索多元主体合作办学;推进民营企业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和生态产品提供,引导民营经济服务可持续发展战略、支持民间资本参与生态建设项目投资,允许发展生态产业。(3)因地制宜助推共同富裕。共同富裕不是均等富裕,也不是同时富

裕,区域协调发展也不是平均发展、同构发展,受区域位置、环境因素、人口、教育水平、数字技术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政策制定标准划分以及进程评估过程中,统一性与灵活性兼顾,因地制宜采取措施,使得不同区域富裕水平得到实质性的发展。□

### 参考文献:

- [1]杨美勤,唐鸣.习近平“两山”论的四重逻辑[J].科学社会主义,2019(6):87-92.
- [2]曾贤刚,秦颖.“两山论”的发展模式及实践路径[J].教学与研究,2018(10):17-24.
- [3]徐磊.习近平“两山论”再探:生态生产力的新视界[J].广西社会科学,2019(6):18-22.
- [4]王欣.探讨“两山论”实践路径加快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无废城市”[J].环境保护,2019,47(20):39-42.
- [5]林业江,钟泓,栗维斌.践行“两山论”永葆漓江水绿山青[J].旅游学刊,2020,35(10):3-4.
- [6]尹铎,朱竑.“两山论”与旅游情境下自然的商品化[J].旅游学刊,2020,35(10):8-9.
- [7]王朝明,徐成波,丁志帆.共同富裕:理论思考与现实审视:基于国家级城乡统筹实验区(成都)的经验证据[J].当代经济研究,2012(8):38-45.
- [8]付志平,张光辉.“共同富裕”视阈下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问题论析[J].社会科学辑刊,2013(4):47-50.
- [9]王淑曼,康达西,程金龙.“两山论”谱写乡村旅游新篇章[J].旅游学刊,2020,35(10):9-12.
- [10]徐达,鲍铭铭,陈希帆,等.“两山”理念视域下“文旅融合创新发展”的实践与探索:以浙江湖州为例[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15(4):23-28.
- [11]崔凤军.休闲旅游业: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之间的重要转换器[J].旅游学刊,2020,35(10):1-3.
- [12]邹统钎.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转化的乡村旅游机制探讨[J].旅游学刊,2020,35(10):4-7.
- [13]丁声俊.以“两山论”为引领振兴中国木本粮油特色产业[J].中州学刊,2019(7):31-37.
- [14]顾金喜.环境群体性事件的源头治理:基于“两山论”在浙江的实践分析[J].浙江社会科学,2016(7):83-89.
- [15]步青云,白璐.贯彻落实“两山论”,深入推进环评制度改革[J].环境保护,2019,47(23):45-48.
- [16]唐绍均,魏雨.“两山论”的解释力、分类实践与制度回应[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41(4):38-45.
- [17]王凯.两山论、两条底线与自然资源治理[J].中国环境管理,2019,11(4):99-104.
- [18]田淑英,夏梦丽,金伟.新安江流域安徽段践行“两山论”的模式探索[J].江淮论坛,2019(2):57-62.
- [19]NERFIN M. Another development approaches and strategies [M]. Uppsala: Dag Hammarskjöld Foundation, 1977.
- [20]JENKINS T N. Putting postmodernity into practice: Endogenous development and the role of traditional cultures in the rural development of marginal region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00, 34(3): 301-314.



[21]张环宙, 周永广, 魏蕙雅, 等. 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的乡村旅游内生式发展的实证研究: 以浙江浦江仙华山山村为例[J]. 旅游学刊, 2008, 23 (2): 65-71.

[22]赵海涛, 李梓恒, 刘书睿. 乡村振兴视域下新内生式发展理论的解释: 以北京市平谷区T村为例[J]. 安徽农学通报, 2019, 25 (13): 10-14.

[23]张秋菊, 张超锋. 农村内生式发展的理论和政策实践: 以日本中山间地区等直接补助制度为例[J]. 世界农业, 2020 (11): 20-28.

[24]郭艳军, 刘彦随, 李裕瑞. 农村内生式发展机理与实证分析: 以北京市顺义区北郎中村为例[J]. 经济地理, 2012, 32 (9): 114-119.

[25]邓国胜, 李怀瑞. 情景建构、制度内生与自主治理: 公益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创新路径[J]. 学海, 2019 (6): 44-49.

[26]VAN DER PLEOG J D, SACCOMANDI V. On the impact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agriculture [M]//VAN DER PLEOG J D, VAN DIJK G. Beyond modernization. The impact of endogenous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Assen: Van Gorcum, 1995.

[27][日]宫本宪一. 环境经济学[M]. 朴玉,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4.

[28]夏娇娇. 共享理念的伦理研究[D]. 长沙: 湖南师范大学, 2019.

[29]燕连福, 郭世平, 樊志远. 论脱贫攻坚精神的形成基础、核心内涵和弘扬路径[J]. 思想教育研究, 2021 (3): 3-6.

[30]张志勇. 关于共同富裕可能性的哲学价值观思考[J]. 商业时代, 2012 (30): 19-21.

[31]赵学清. 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共同富裕[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 2014, 30 (2): 50-55.

[32]PIKETTY T. About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5(5): 48-53.

[33]SASMAL R, SASMAL J. Public expenditure, economic growth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al Economics, 2016, 43(6): 604-618.

[34]葛道顺. 新时代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和观察指标[J]. 国家治理, 2021 (30): 8-11.

[35]马金涛, 卜新春, 温胜强. 甘肃省区域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度研究[J]. 安徽农业科学, 2019, 47 (24): 88-93.

[36]王少剑, 崔子恬, 林靖杰, 等. 珠三角地区城镇化与生态韧性的耦合协调研究[J]. 地理学报, 2021, 76 (4): 973-991.

[37]张瑞萍. 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研究综述[J]. 经济问题探索, 2016 (12): 179-183.

[38]陈友华. 全面小康的内涵及评价指标体系构建[J]. 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2017 (5): 80-89.

[39]WANG J Y, WEI X M, GUO Q. A three-dimensional evaluation model for regional carrying capacity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o soci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development and a case study in China [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018, 89: 348-355.

(责任编辑: 保文秀)

(上接194页)

[16]郑君君, 董金辉, 任天宇. 基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的随机微分合作博弈[J]. 管理科学学报, 2021, 24 (7): 76-93.

[17]余泳泽, 郭梦华, 郭欣. 社会信用的经济效应研究回顾与展望[J]. 宏观质量研究, 2019, 7 (4): 80-95.

[18]龙凤, 葛察忠, 林菲, 等. 环境保护税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基于税额标准的提高[J]. 中国环境管理, 2021, 13 (5): 127-134.

[19]孙正林, 卞晨, 初钊鹏, 等. 政府监管视域下碳排放规制与企业低碳技术创新演化仿真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21, 40 (12): 103-112.

[20]CHEN Y X, ZHANG J, TADIKAMALLA P R, et al. The relationship among government, enterprise, and public in environment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player evolutionary gam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2019, 16(18): 3351.

[21]卞晨, 初钊鹏, 孙正林. 环境规制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仿真研究[J]. 工业技术经济, 2021, 40 (7): 12-22.

[22]初钊鹏, 卞晨, 刘昌新, 等. 雾霾污染、规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演化仿真研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9, 29 (7): 101-111.

[23]XU R, WANG Y R, WANG W B, et al. Evolutionary game analysis for third-party governance of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J]. Journal of Ambient Intelligence and Humanized Computing, 2019, 10(8): 3143-3154.

[24]周志方, 刘珂, 曾辉祥. 土壤重金属污染治理多方演化博弈研究[J]. 生态经济, 2021, 37 (4): 183-193.

[25]方韬, 李才华, 张粒子. 发电企业环境成本研究[J]. 中国电力, 2005 (11): 16-20.

[26]黄毅祥. 售电侧放开后电力市场垄断与竞争的寡头博弈研究[J]. 西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21, 43 (5): 142-151.

[27]HESAMZADEH M R, BIGGAR D R, BUNN D W, et al. The impact of generator market power on the electricity hedge market [J]. Energy Economics, 2020, 86: 104649.

[28]RAZMI P, BUYGI M O, ESMALIFALAK M. Collusion Strategy Investigation and detection for generation units in electricity market using supervised learning paradigm [J]. IEEE Systems Journal, 2021, 15(1): 146-157.

[29]刘超. 管制、互动与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15, 25 (2): 96-104.

[30]马腾, 曹吉鸣, 李冲, 等. 基于知识中介的项目型组织知识转移多群体演化博弈分析[J]. 复杂系统与复杂性科学, 2016, 13 (3): 86-96.

[31]陈皓勇, 付超, 刘阳, 等. 寡头垄断电力市场实验设计与博弈分析[J]. 电力系统自动化, 2006 (19): 1-6.

[32]张新华, 叶泽, 赖明勇, 等. 考虑价格上限的寡头发电投资阈值与容量选择[J]. 管理科学学报, 2012, 15 (9): 1-9.

(责任编辑: 冯胜军)